

俞樾与日本友人的交往

王卫平

俞樾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，在经学、史学、诗词、散文诸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。他的著作不仅流布国内，而且还远播于海外。他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也颇为密切。

一、俞樾与竹添光鸿的友谊

竹添光鸿，字渐卿，号井井，日本文学博士，曾任日本驻中国天津领事、朝鲜公使，后弃政执教，为东京大学教授。他对中国的经史之学很有研究，著有《论语会笺》、《左氏会笺》等著作。竹添光鸿先前拜读俞樾的著作，心中十分敬慕。来华后即到杭州西湖诂经精舍造访，适值俞樾居苏州，乃由杭至苏，相见于曲园春在堂，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。

竹添光鸿颇重“孔孟之道”，这与俞樾的想法不谋而合，故一见倾心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俞樾与之纵谈国事，横论学术。他在《春在堂随笔》中有详细记载：“日本人竹添光鸿……至苏寓，过我春在草堂，以诗文见示，并以《栈云峡雨日记》求序……其学识颇有过人者。赠余诗有云：‘神仙若使玉堂老，辜负湖山晴雨奇’。余与之笔谈，及其国事，渐卿曰：‘……自封建废，而诸侯失国，士亦削禄。列国学宫，多用西学，以谋仕进之捷径。孔孟之道，几乎扫地，一时殆有焚书之议。近时风俗偷薄，庙堂亦颇悔悟，稍知圣道。而西洋诸国源源而来，交际之道，非通西情，则受彼之侮。故圣学洋学混为一途，终不能复昔时之盛。’又曰：‘此番归国后，必当再来中国，然朝廷之许与否，

不可知。若不得请，惟有退而授读田间，以避西风之逼人也。’味其言，盖亦彼国有志之士矣……其余所言尚多，不能悉录。”此次会面，话题宽泛，尽管语言不通，却有知己之感，以致在彼此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俞樾在《春在堂随笔》、《东瀛诗纪》、《春在堂诗编》、《春在堂词录》等书中都有记述。竹添光鸿也希望重来中华，再续旧叙。此愿虽未能果，但双方时通音讯，诗书往还，研讨学问，商谈时事，互致问候。如《春在堂尺牋》收有俞樾《与日本儒官竹添井井》一信，谓：“鹤望方殷，鱼书忽贲，始知归帆安稳，吟席清闲，遥企东瀛，良用欣慰……想博望仙槎再游禹迹，当在明年春夏间矣。承寄安井先生《论语集说》，采择精详，佳作也。拙著各书，想贵国具有之，谨寄奉新刻之《曲园杂纂》五十卷，伏希鉴入。”此后的《与日本人竹添进一》信中说：“冈鹿门来，得手书并承惠《玉篇》一册，高句丽蓂二斤，足见在远不忘之意，感谢之至。”两人之间的友情，见诸字里行间。

二、俞樾与井上政的师生情谊

井上政，字子德，别字陈，以日本大藏省官学生的身分来华，后来任过日本驻英大使。1884年井上政来到中国，久仰俞樾之名，遂至杭州俞楼谒见，愿受业门下。在《井上陈子德〈西行日记〉序》中，俞樾记道：“井上子德，自东瀛来游中土，谒余于湖楼，愿留而受业于门，余辞焉。则固以请，余乃语之曰：‘……子能从我约乎？’子德唯唯。已而出一编见示曰：‘此吾纪游之作，模山范水，固先生所许也。’余读之……子德之才必有大过人者。吾惧曩者之所限，不足以限于德也。余老矣，隶门下之籍者，无虑数百人，今得子德，殊有吾道东矣之叹。”^①事实证明，井上政是个勤奋刻苦的青年，他坚守约束，深受俞樾赏识。当他学成归国时，俞樾赋诗赠之：“日东遥望海茫茫，送子吴门酒一

觴；万里归人同晁监（自注：唐王维有送秘书晁监还日本诗），三年吾党得陈良。攀吟宰树情何极（自注：将拜其师得能局长之墓），起舞斑衣乐未央（自注：其二亲均无恙）；更愿异时仍过我，尊前重与话扶桑。”（《春在堂诗编》十二）表达了依依不舍的感情。对于俞樾培育东瀛人才之事，日本人给予很高评价：“子德尝游门下数年，学问文章大有所进，我国亦以为是有用材，此皆先生之赐也。呜呼！先生积德育才之泽，不唯中国士大夫涵沐之，旋及遐岛异朝之国，其仁岂不大哉！”^②

井上政不仅钦佩俞樾高深的学问，说他“博贯群籍，穷览众流，茹古涵今，无有端涯……所著《春在堂全书》，殆至五百卷，洵可谓袭轨许、郑，齐驱顾、阎，上下千岁，高骧独步者也。”更折服于俞樾的人品，称颂他“雅性秉让，恺悌宽裕，道识虚旷，表里融和”以至“缙贤绅士，遐方后生，莫不熙怡悦怿，同情瞻仰，聆嘉声而响赴，服高义而景从”。他说自己“向者赋游禹域，委质门墙，传经受业，沐仁涵德。旋归之后，不胜赞仰”。^③由此可见俞樾在井上政心目中的地位。井上政十分珍惜与俞樾的师生情谊。俞樾在编《东瀛诗选》时，见日本诗人盛称樱花之美，非常思慕。井上政得知此事，便选了四棵小树植于瓦盆中，由海上寄至苏州。对于古人所说“纸可为衣”，俞樾曾表示怀疑，后井上政寄赠一端日本所产纸布，俞樾十分高兴，赋有《纸布诗》，并称之为“一奇”^④。尤可称道的是，当俞樾七十寿辰时，井上政虽身为日本驻英大使，公务繁忙，仍抽暇写了一则“征诗启事”，向日本学者介绍俞樾的成就并征集祝颂先生七十大寿的诗文。俞樾遂将这些颂文编为一集，名曰《东海投桃集》，在所作序文中对此事的前因后果有较为详细的讲说：当七十寿辰之际，本意“不觴一客，亦不受一诗一文之赠……不图日本有旧隶门下之井上陈子德为我编征诗文，余固不知也。至明年八月由李伯行星使寄至姑苏，余不禁哑然而笑曰：‘在本国则却之，在彼

国则受之，其谓我何？’虽然余七十生辰固在去年也，而东国诗文之来则在今年，是可例之寻常投赠而不必以寿言论矣。自惟卅载虚名，流播海外，承东瀛诸君子不我遐弃，雕镂朽木，刻画无盐，其雅意亦何可负哉。因编次其诗文为一卷，题曰东海投桃集，以识诸君爱我之情，亦见中外同文之盛。”《东海投桃集》表达了日本学者对俞樾的钦敬之情。它的成书固然是一件盛事，而俞樾与井上政的师生之谊，更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动人佳话。

三、俞樾与岸田国华的心慕

岸田国华，字吟香，他与俞樾从未谋面，但通过彼此友人如僧心泉等介绍，两人心仪已久，相互敬重。1882年秋，俞樾病居苏州。岸田国华搜集百年来日本诗人集子一百七十家，由来华的松林上人带到苏州，请俞樾代为编选诗歌总集。俞樾有诗记道：

“平生浪窃是虚名，老去声华久不争；隐几坐方学南郭，寓书来又自东瀛。吴中病榻鸡皮叟，海外骚坛牛耳盟；百七十家诗集在，摩挲倦眼看难明。”（《春在堂诗编》十）他在《东瀛诗纪序》中大致述说了事情的经过：“有日本国人岸田国华，以其国人所著诗集百数十家，请余选定，初意欲以衰疾辞。既而思之，海内外习俗虽异，文字则同。余谬以虚名流播海外，遂得假铅槧之事，与东瀛诸君子结文字之缘，未始非暮年之一乐也，因受而不辞。”费时五月，成书四十卷并补遗四卷。在此过程中，俞樾曾就编选方法与另一日本友人僧心泉通信商讨，提出“选诗当以人分，不以体分，每人选刻古今体诗若干首，略以时代先后为次”，在“每人之下，就其全集中或评论其生平，或摘录其未选之佳句，使读者应一斑而窥全豹。”（《春在堂尺牘》六）编成后，俞樾寄与僧心泉，由日本国自行刊刻，“颇盛行于海东矣”。

《东瀛诗选》对促进日本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居有重要地位。它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上毛河世宁

纂辑中国《全唐诗逸》两相比照，前后辉映，反映了中日同文的盛况。

谈及俞樾与岸田国华的交往，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说。岸田国华以五十之龄，始得儿子，自是喜不自胜，乃请俞樾为其子起名。俞樾因古人称五十曰艾，故名之曰艾生，并赠诗云：“半百初听雏凤鸣，此儿合以艾为名，请看二十余年后，争向东瀛访艾生。”《春在堂诗编》十一）

俞樾与日本友人的诚挚友谊和密切交往，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。而《东海投桃集》与《东瀛诗选》，既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同文盛况，又是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友好的具体表征。

注：

- ①《春在堂杂文》四编卷八。
- ②《东海投桃集》小幡俨文。
- ③《东海投桃集》井上政“征诗启及事略”。
- ④《春在堂诗编》十二、十四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苏州大学历史系